

话说周氏兄弟

——北大演讲录

钱理群

历史精英
不能靠教学一纸精神
写下许多小书
却只能学教人尊贵的四舍五入法
记一笔总账
人类在我前行的历史

正如你的所说
正如你的所说，钱理群只是一个小块
现在是在讲过去
这是清华的断片
二十世纪大舞台上一块小小的
许多人物

他们他们的行将高论
他们他们的行将高论
这是北可奈何的
以挽留下的，则一定并留
与史是公正的

不因一瞬之成败，或早
而遗忘，抱并
不因或遗忘存在的生命的创造
这是真正的世纪思想文化遗产
本书只有一小块

山东教育出版社

话说周氏兄弟

——北大演讲录

钱理群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周氏兄弟:北大讲演录/钱理群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603-352-1

I. 话… II. 钱… III. ①鲁迅(1881~1936)-研究②周作人-研究 IV. 1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654 号

书 名 话说周氏兄弟

著 者 钱理群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址: 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编: 276002)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787 × 1092 毫米)

10 印张 21 幅图 158 千字

印 数 7001—9000

I S B N 7-80603-352-1/Z · 65

定 价 1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引 言

鲁迅说：“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总数。”

鲁迅又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现在是世纪末，正是结账的时候。

二十世纪大舞台上风云一时的许多人物，连同他们的种种高论，大概都要在这历史的结账里被忽略不计，这是无可奈何的。

但该留下的，则一定存留；历史是公正的，不因一时之成败、毁誉，而遗忘、抛弃不应被遗忘、抛弃的生命的创造。

这是真正的世纪思想文化遗产，尽管只有一小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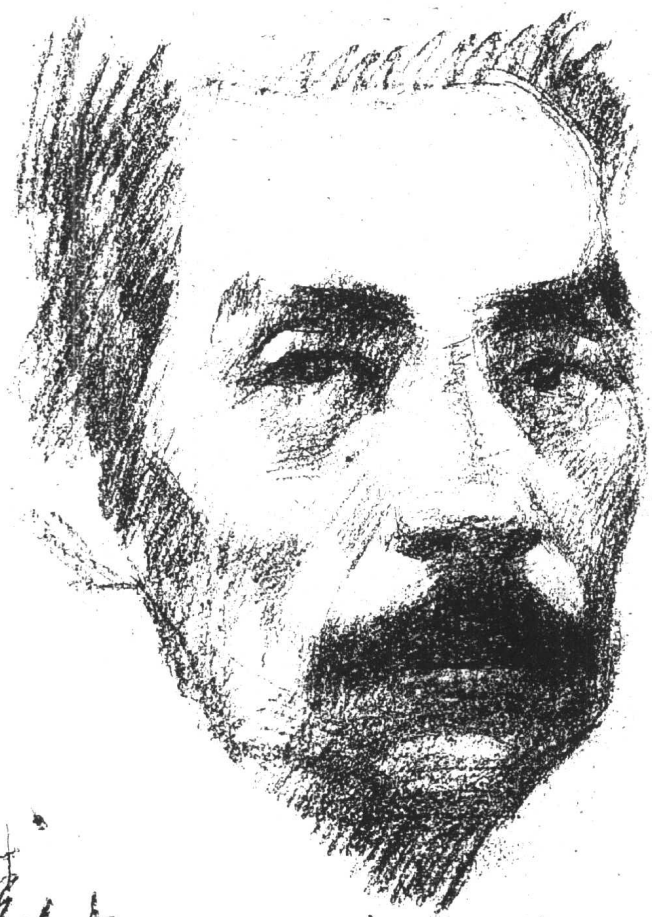
在这一小块中，就有鲁迅、周作人的贡献——对他们的思想与文学，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两个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的名字。他们的思想与文学已经融入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传统；他们开始的思考，将在后代人中承续。

我们今天来“话说周氏兄弟”，实际上就是在话说这一个世纪先驱者们曾经关注过的思想命题，他们探索中的矛盾、困惑与收获。同时也是将周氏兄弟请来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思考——我们面临着与他们当年类似的困惑，又有许多新的时代所提出的矛盾与问题；在这样的时刻，特别需要鲁迅、周作人那样的胆识，眼光以及远见；重温当年的文字，我们甚至会觉得，他们就生活在现实的中国，和他们进行精神的对话，实在是莫大的快事。

但鲁迅说，在我的文字背后，浸透着“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这是一个世纪血战前行的历史的结晶，这一百年来，我们民族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真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这是带血的世纪思想遗产啊。

接受这份遗产，是需要勇气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地狱的门口：“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者，请进去；否则，趁早离开。

我们如何选择？——还是进去吧。



李德

我们今天来“话说周氏兄弟”，实际上就是在话说这一个世纪先驱者们曾经关注过的思想命题，他们探索中的矛盾、困惑与收获。同时也是将周氏兄弟请来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思考——我们面临着与他们当年类似的困惑，又有许多新的时代所提出的矛盾与问题；在这样的时刻，特别需要鲁迅、周作人那样的胆识、眼光与远见；重温当年的文字，我们甚至会觉得，他们就生活在现实的中国，和他们进行精神的对话，实在是莫大的快事。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讲	“立人”思想	————— 1
第二讲	妇女观与儿童观	————— 30
第三讲	外来文化观（上）	————— 61
第四讲	外来文化观（下）	————— 90
第五讲	传统文化观（上）	————— 111
第六讲	传统文化观（下）	————— 138
第七讲	说“食人”——“改造国民性” 思想之一	————— 157
第八讲	谈“做梦”——“改造国民性” 思想之二	————— 179
第九讲	论“演戏”——“改造国民性” 思想之三	————— 198
第十讲	析“主与奴”（上）——“改造国	

	民性”思想之四	234
第十一讲	析“主与奴”(下)——“改造国	
	民性”思想之五	249
第十二讲	有意味的参照	278
后 记		303

第一讲 “立人”思想

(一九九七年九月九日、九月十六日讲)

鲁迅、周作人不像其他哲学家一样有一个自己建构的非常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作为研究者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中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命题，作为他思考的整个基础的出发点。“立人”就是这样的鲁迅、周作人共同的思考的基础、出发点、核心内容。当然，他们对“立人”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鲁迅的“立人”思想主要体现在本世纪初他写的几篇文章中，收在《坟》里，用文言文写的。在本世纪初，当鲁迅开始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时候，他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目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或者说人文学者，文学家，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他说：“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

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这一代人，一开始就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背景下，从对整个世界的趋势的洞察中来探寻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他因此提出要从两方面来努力：一方面要不落后于世界思潮，不断从世界思潮中吸取养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拿来”；另一方面，又不离开原来的血脉，要从中国传统中去寻找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通常称之为“继承”。但这样的广泛的吸取，无论“拿来”还是“继承”，并不是目的，“创造”才是最根本的。“取今复古”，是为了“别立新宗”，创造出一种新的思想。

请大家注意：鲁迅这里使用的是“新宗”的概念。“宗”是什么？“宗”即“宗旨”、“宗极”，是主要的、本源性的东西。这就是说，鲁迅在本世纪一开始，就给自己，也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给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确立了一个战略性的目标：要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价值，提供一个终极性的理想。在目标确立以后，还有一个实现目标的道路的选择问题。鲁迅固然十分重视对外国的与传统的思想资源广泛吸取，但他认为，那毕竟是他人（外国人与古人）的创造，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前述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也只能仰仗于今人的独立与自由的创造。鲁迅之所以大声疾呼“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原因即在于此。在这里，究竟立足于“拿来”、“继承”，还是立足于“创造”，也是一个重大的思想

文化的战略选择的问题。现在，这一个世纪就要结束了，如果我们来作一番回顾与总结，考察一下百年学术史，就不能不面对一个严重的事实：本世纪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哲学史家、文学史家，却少有独立、自由创造的思想家，特别是“别立新宗”的思想家。也就是说我们最有成就的是拿来，是继承，是在整理、重新阐释东西方传统，但在创造方面，成就却不大。我想，这无须多作论证，只要看看本世纪大家最仰慕的几个大学者（恕我不一一列举出他们的大名），如果作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考察，就必须承认，他们的主要成就确实在介绍与阐释。怪不得一位年轻人说，中国的学者都是些“注释家”与“翻译家”，这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确实是道出了某些“真实”的。王富仁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也作了类似的总结。他说，本世纪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附文化”，不是依附西方，就是依附中国传统，缺少独立创造。这就十分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最大缺失，就是创造的缺失，独立思想的缺失，对本世纪初鲁迅等先驱者所提出的“别立新宗”的战略目标，我们几乎交了一张白卷。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是令人沉痛的，也会有几分尴尬；但我们已别无选择，只能正视并且从正视中逼出新的觉醒：“一切重新来过”，回到起点上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世纪末，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时，一方

面要继续强调继承、拿来，因为本世纪也有过否认拿来、否认继承，全盘否定中外传统，最后导致了对文化、知识本身的否定的惨痛教训。但我们的重点，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应该放在“创造——独立、自由的思想创造”这一点上。去年我曾在北大做过一个演讲，我在演讲中呼吁，现在还要重新呼吁，我们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我们呼唤新的思想家的出现，呼唤有思想的学者，呼唤新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学者有两类，一类是有专业知识的学者，一类是在专业知识基础上有思想创造的学者。在我看来，北京大学就应该着重于培养思想家，培养有思想的学问家，有思想的专业学者。在座的诸位，所有的北大学子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志向，或者说，有没有胆识接受时代所提出的挑战，担负历史赋予的这一使命。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在今天听课的年轻一代中产生这样的思想家。我想，今后出现的不一定是个人，也可能是个群体，出现思想家群体。我们今天，以及下一个世纪所面临的问题，远比任何时代都复杂得多，已经不是个别的天才所能解决的了。总而言之，要重新确立“别立新宗”的战略目标，重新培养富有独立、自由的创造精神的“精神界之战士”，一切从头（从起点、原点）开始，这就是我们在接受鲁迅的思想遗产，总结百年历史时，所得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结论。



生命的路

现在我们再回到鲁迅在本世纪初的思考上来。他早期写的几篇文章的题目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人之历史》，着重地考察在他之前人类研究的科学成就，比如康德的关于宇宙起源的“星云学说”，特别是海格尔的“人类种族的起源和系统论”。《科学史教篇》着重研究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历史，特别关注的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居里夫妇刚刚发现了镭，没多久，一九〇三年，鲁迅就写了《说钋》，介绍、阐释这一最新科学发现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关注的中心始终是自然科学发展对人类思维发生的影响。因此他从海格尔人类学研究中引发出的是关于无生物与生物的转化，生物之间互相转化的思想。他在《说钋》中强调镭的发现打破了物质可以穷尽的说法，导致了人类物质观念的根本变化。他的这一观察视角是真正高瞻远瞩的，对我们今天的思考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可以预计，二十一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将会更加惊人，对整个人类生活的环境以及人类自身都会提出很多挑战性问题。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许多人文学者（当然包括我在内）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而且至今为止，仍然很少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失误，而且恐怕是灾难性的，将会影响到未来人文科学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失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鲁迅当年的眼光，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对自然科学所带来的人类思维的变化关注，对我们应

是一个很大的警示。

鲁迅还有一篇《文化偏至论》，提出了文化选择的问题。他回顾了罗马统一欧洲以后，欧洲的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有意思的是，他在对欧洲思想史的总结中，关注的不是十九世纪思潮，而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最新发展，即所谓“神思宗之新”，也就是说，他所瞩目的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在鲁迅介绍之后中断了六七十年，在八十年代重新引起注意的一批思想家，例如尼采（当时译为尼佉），克尔凯郭尔（契开迦尔）、斯蒂纳（斯契纳尔）等。这几个人在西方当时也刚刚开始引人注目。这表明，鲁迅在本世纪初接触西方思潮时，他的选择，除了进化论之外，主要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他所承接是这样一个思想谱系。这一点几乎超出了同代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是超前的。鲁迅这一文化选择，对于鲁迅自身思想，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影响与意义，是我们感到兴趣的。

于是，我们注意到这几位西方思想家，无论是尼采，是克尔凯郭尔，还是斯蒂纳，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文化、十九世纪工业文明的反叛，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对十九世纪西方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和批判。鲁迅从一开始就选择对西方现代化进行批判的学说作为主要的精神

来源，这在鲁迅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鲁迅把尼采、克尔凯郭尔、斯蒂纳的思想作为他所面临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的武器，或者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语言说，对中国的前现代的思想进行批判。与此同时，鲁迅也借助于这些“神思宗之新”的思想成果，对西方的现代化、工业文明的道路进行独立的检讨。从一开始，鲁迅就给自己确立了这样的双重的思想批判任务，进行双向的思考。他的目的，是寻找中国自己的“近世文明”（也即今天所说的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点鲁迅一开始就十分自觉。同时，鲁迅也清醒地意识到，他所介绍的这样的新思潮，并不代表西方全部的思想遗产，他引入这些思想并不是为中国的将来立下规则。也就是说，他不试图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完全纳入西方最新思潮（尽管他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的思想模式中，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借鉴，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那样，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别立新宗”，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创立一个新的价值理想。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他提出了自己的“立人”思想。

先谈对“人”的看法。他提出一个“个”的概念。“个”对应的是“类”。他说，在他的时代，或者传统流行的对人的看法，是把人归于某一“类”。或者说“汝为国民”，或者称“汝为世界人”，也就是说或者把人看成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附属（工具），